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欧阳哲生
编

傅斯年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欧阳哲生
编

傅斯年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傅斯年卷/欧阳哲生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300-18722-8

I. ①中… II. ①欧…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傅斯年 (1896~195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31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傅斯年卷

欧阳哲生 编

Fu Sini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8.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10 000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

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

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

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

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

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

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迅速转型的时代。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星空，依据知识人与思想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理论建构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或建造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或输入外来思想理论（如严复、胡适），为时代的理论建树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现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论著大都以这类人物为研究对象或研究题材。第二类是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或文化学术领域，对时代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主张，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发言人。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缺乏原创性，只是某种舆论的代言人。第三类是基本恪守在自己工作的专业领域，不轻易对非专业领域的变动发表言论或看法，思想具有较强的本专业学理性质。如就对时代的思想影响而言，傅斯年介乎第二、三类。故在通论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里，我们常常找不到有关专门论述他的思想的章节。

但傅斯年决不是一个能被人轻易忽略的历史人物。傅斯年从早年进入北京大学苦读六年，到负笈留学英、德七载，从创设中央研究院第一大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到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都身处知识圈的高层，身负重任，运筹帷幄，是圈内的核心人物之一。傅斯年富有个性、极具主张、敢于陈词，这使他的言论具有代表性和冲击力。傅斯年是留学欧美知识精英的代表，是中西文化融会的精粹。在近代文化思想界，他是中国文化“西化”倾向的代言人，是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科学化”的大力推动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他虽没有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只有表述个人思想主张的若干言论文字，但就是这些数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现的坚定

立场和明确取向，足以使其成为某种思想选择的代表，从而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一、思想主题的初步展开：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

傅斯年思想的第一次喷发是在五四时期。正如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知识精英提供了表现思想的舞台一样，五四运动为年轻一代创造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傅斯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本科（1913—1919年）的六年时光，正是北大积聚全国人材的重要发展时期。京师大学堂遗留的桐城派，民国初年北上的章太炎一系，镀金镀银的“海归”汇聚北大，使北大成为各个流派、各种外来知识来源的荟萃之地。这里积聚各种力量，同时各种力量在这里寻机较量，政治、文化充满变数，新思想的力量努力寻找自己的突破口。蔡元培主长北大，陈独秀执掌文科学长，《新青年》搬入北大，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海归”进入北大任教，1917年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动，终于在这里实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新的思想潮流在急剧酝酿之中，蓄势喷发。

傅斯年是率先向《新青年》投稿的北大学生，他先后在该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文，步胡适、陈独秀之后，继续猛烈抨击占据晚清文坛的桐城末流“最不足观”，盛推“新文学之伟大精神”，“明确而非含糊，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①。同时将视角由“破坏”转向“建设”，从“文言合一”、“戏剧改良”方面对新文学提出更为具体、切实的建设性意见，这使他成为北大学生在新文学阵营的排头兵。这些文章见解之成熟、文字之练达，不让于他的老师。对于正在推进的白话文运动，傅斯年表达了一些在后世看来颇带“形式主义”色彩的激进意见，如提出写作白话文可“直用西洋词法”，“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②。指陈中国文艺界之病根在于“为士人所专”，“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改进之途：“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③《新青年》曾就汉语是否可改用拼音文字展开讨论，此问题首因《新青年》四卷一号刊发钱玄同《论注音字母》一文而起，一向言论偏

① 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②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③ 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激的吴稚晖却回复钱玄同与之商榷。^① 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这篇“急就章”里，傅斯年明确回答了当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1）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2）汉语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3）汉字能无须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否？答：绝对的不可能。……（5）汉语的拼音字如何施行？答：先从制作拼音文字字典做起。”^② 这篇文字在读者群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它被当作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代表作，常为后来的论者所诟病。实际上，这场讨论蕴藏着某种有意偏激的策略运用，诚如鲁迅后来所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③ 在新文化阵营里，傅斯年与胡适、周作人这些“新生代”代表的共同话语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发出他们不便发表的更为激进的声音。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期间，本专业虽是国文，但其涉猎范围却文、史、哲兼收，具有“通才”的素养，这是一个大家的雏形。在文学语言方面，他发表了《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书评《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乐府诗集〉一百卷》、《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在史学方面，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书评《史记志疑》；在哲学方面，他发表了《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书评《论理学讲义》、《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之感念》，这些文字并非浮泛之论，而是具有专业的水准。请看他推荐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理由，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见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者，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

① 参见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②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1919年3月1日《新潮》第1卷第3号。

③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第4卷，1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①

再看他对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的评论，全力提倡一种“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的疑古精神：

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辨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盖于《史记》删改之迹，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怀琴之《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②

再看他对哲学的理解，完全是以近代科学为基准：

所谓哲学的正经轨道，决不会指初民的国民思想，决不会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备系统的哲学，定是指近代的哲学；更严格的说起来，应当指最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学——因为旧哲学的各种系统，经过一番科学大进步以后，很少可以存在的，只有应时而起的新系统，可以希望发展。……近半世纪里，哲学的惟一彩色是受科学的洗礼，其先是受自然科学的洗礼，后来是受人事科学（Social Science）的洗礼。^③

这些观点显然是傅斯年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的明证。他对西方学术知识有着直接寻求的欲望，在大学时期即已养成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习惯，同窗罗家伦说他“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④，在他的藏书里，人们可找到一些1918年前购买的英文原版书，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罗素的《哲学的科学方法》、杜威等编的《创造性思维：实验主义论文集》。^⑤傅斯年这种泛人文倾向与他追慕的偶像胡适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① 傅斯年：《出版界评·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② 傅斯年：《故书新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③ 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④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

⑤ 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傅斯年的学术早熟在他的学术评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全面反思中国传统学术，指责其所存七大基本误谬：（1）“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2）“不以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3）“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4）“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5）“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6）“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是赖。”“名家之学，中土绝少。”（7）“吾又见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①他对传统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清算。以为“惟此基本误谬为中国思想不良之物质，又为最有势力之特质，则欲澄清中国思想界，宜自去此基本误谬始。且惟此基本误谬分别中西思想之根本精神，则欲收容西洋学术思想以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误谬，然后有以不相左矣”^②。傅斯年明晰中西学术之优劣，表达了接受西方学术的强烈意愿。

傅斯年对当时学界诸多名家的批评，表现了不凡的学术探索精神和思想锐气，从北大流传他指摘章太炎弟子朱蓬仙教授《文心雕龙》讲义稿错误的故事，到他被同学拉去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课，以鉴别胡适学问的高低。傅斯年俨然成为一位学生推戴的“学监”或学术警察。从他批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先生之书，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③，到借评论蒋维乔编译《论理学讲义》一书对教科书所发的一番议论；从他对严译的酷评，“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④，到他对当时在北大占主流地位的章太炎派发出不屑的轻蔑，“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⑤这些学术评论表现了傅斯年为代表的新青年追求科学的取向，在这些批评言词的背后，人们可以感受到“西学输入”带来的新学术规范正在改

①②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③ 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④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⑤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变学术的评价规则。胡适“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①。年轻一代经过新思潮的洗礼，长江后浪推前浪，显现超越师辈、后来居上的势头。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东学”乘势在中国传播开来。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隲藏在其著《支那史要》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的汉族缔造时代、中古的汉族极盛时代、近古的蒙古族代兴时代、近世欧人东渐时代四期。其说因该著译为汉文，在国内学界甚为流行，所谓“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纲者”。傅斯年不同意其说。他从“分期标准之不一”、“误认为在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两方面加以批驳，以为“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为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其弊二也。”^②从西方直接获取学术资源的五四学人开始与“东学”明争暗战，中日之间由此开启一场“学战”。

傅斯年是《新潮》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撰写了《〈新潮〉发刊旨趣书》，而且在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前几期甚至于有“包揽”之嫌，成为该刊最引人注目的“急先锋”。胡适曾盛推《新潮》：“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③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中，傅斯年将思想锋芒伸向了社会，表现了对社会、对人生探究的兴趣。从清末以来，追求进步的学人将思想探索的目光聚焦在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人们引向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一是如何将民族、国家、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序、协调、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人们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考反映了这方面的探寻。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实为对传统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突破。

什么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势力？傅斯年的回答是“中国的家庭”。

①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

②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载1918年4月17日至23日《北京大学日刊》。

③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见《胡适作品集》第24册，17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

“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他视腐败的旧家庭为“万恶之原”，“希望其改造成新式”，但不主张像无政府主义那样废除家庭制度。^①傅斯年对个性的追求可从他对“疯子”的赞扬可见：“在现在的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②这里所谓的“疯子”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同类。傅斯年与鲁迅一样，也受到尼采式“超人”思想影响。^③

傅斯年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的建设，这是他五四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④创刊《新潮》时他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故《新潮》以重建社会为其四大责任之一。傅斯年批判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即“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的四大表现后，提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⑤。显然，他所崇尚的人生观是与“公众的福利”联系在一起。在傅斯年看来，“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要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他区别了两个与此相关的概念：“社会上之秩序”与“社会内之秩序”。“前者谓社会表面上的安宁，后者谓社会组织上的系统。”中国社会内部秩序“实在是七岔八乱”，“中国社会的内部，不是有条理的，易词言之，是大半不就轨道的”^⑥。为了重建社会，傅斯年提出“社会的信条”，他强调“我们必须

① 傅斯年：《万恶之原（一）》，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② 傅斯年：《一段疯话》，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1卷第4号。

③ 傅斯年与鲁迅通信讨论过《狂人日记》，参见《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④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⑤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⑥ 傅斯年：《社会——群众》，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①。与胡适对“主义”的蔑视不同，傅斯年对“主义”非常重视，“人总是要有主义的”，“没有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他将“主义”的问题与国民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②。他认为五四运动的进步之处表现在对“社会性”的责任心的培养：“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础，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③他甚至认为，“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④。这种重视“社会”的思想很可能是他接近“俄国社会革命”的基因，他期待“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⑤。他甚至作过一次农村社会调查——《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表达他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之情。

胡适提倡个人主义，周作人提倡“新村主义”，他俩曾就各自的思想选择表达诉求并展开争论。以傅斯年与胡适的私人关系而论，他似应站在胡适一边，事实上，在这场争论面前他却显得无所适从。“近中蓄积之问题良多，而毫无解决之法。即如近中胡、周二先生所争之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又如组织所供献之 Efficiency 与自由所供献的 Intelligence，其比较之量如何，又如个人或社会的关系，等等，很难决的问题。对待的两方面，同时在我心识界里各占地盘，一人心识，分成两片，非特本人大苦，而且容易成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因此还只好请学问的救济罢。”^⑥这表现了他对胡适思想的某种保留。

傅斯年的“社会”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斯年自述在北大读书时，“守常的那间房子，在当时几乎是我们一群朋友的俱乐部，在那边无话不谈”^⑦。可见，李大钊当时与傅斯年这群

① 傅斯年：《社会的信条》，载 1919 年 2 月 1 日《新潮》第 1 卷第 2 号。

②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载 1919 年 2 月 1 日《新潮》第 1 卷第 2 号。

③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载 1919 年 11 月 1 日《新青年》第 6 卷第 6 号。

④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载 1996 年 12 月《中国文化》第 14 期。

⑤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载 1919 年 1 月 1 日《新潮》第 1 卷第 1 号。

⑥ 吴稚晖、傅斯年：《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载 1920 年《新教育》第 3 卷第 4 期。

⑦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见《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 4 册，487 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